



一次向往已久的朝圣

张者



本报美编 王超 制图

我第一次去云南是《大家》杂志的一个笔会，那时候《大家》提出了一个写作概念，叫凹凸文本。我当时正在北大读研究生，不知道《大家》的编辑从哪里听说了我的名字，居然邀请我去云南参加笔会。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笔会，因为在这之前我并没有发表过什么作品。当年，《大家》交给我的选题是“大学传”，这就是后来长篇小说《桃李》缘起。可见，云南和我的创作是有缘分的。

我儿子第一次出远门，或者第一次坐飞机去旅游也是云南。那时他才5岁。他提出要求，暑假应该带他出去旅游，比方，那个叫丽江的地方。我不知道他从哪里知道丽江的。那次旅游是我儿子记忆最深刻的，即便到了今天，他已经飞到国外去了，回国居然还和我谈到那次旅行。可见，云南总是让人流连忘返，让人记忆犹新。

但是，我去了云南多次后，有个地方却一直没有去，那就是西南联大旧址。那里成了我内心最想去却迟迟没能成行的地方，因为在我心中那是一个朝圣之地。我向往着那里，关注着那里，却不知道应该用一种什么仪式朝向那里恭敬地弯下腰，低下头，唤一声一个先生的名字。

那里也应该是现代中国人的朝圣之地。云南近代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源里有一武一文，武就是云南陆军讲武堂，文就是西南联大。历史选择了云南，近代文化里不但有了力量的锤炼，还有了精神的唤醒。云南陆军讲武堂和西南联大，这一武一文，相得益彰。

云南陆军讲武堂从1909年开办到1935年停办，在26年的办学历程中，共培养学员近万名。后来改为黄埔军校第五分校。1950年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政大学西南军区军政大学云南分校，1953年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步兵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在辛亥革命、护国起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国家和民族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涌现出一大批军事统帅和军事将领，可谓“帅星闪耀，名将辈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位元帅朱德、叶剑英都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

来到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首先被练兵操场吸引了。这个1907年开始建设，1909年建成开学的讲武堂，现在保存基本完好。这个操场和现在很多中学的操场差不多大。坐在操场边，你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军校学生在操场上一圈又一圈的跑步声。他们的跑步声伴随着跑道上泛起的微尘，脚步声渐渐增大，微尘变成了万马奔腾的硝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位元帅就是从这个不大的操场上，带领同学们奔赴战场，指挥千军万马的。两位元帅肯定没想到，他们从操场上跑出去，还要跑更远的路。要翻山越岭，爬雪山过草地，要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要进行抗战，转战千万里；要进行解放战争，跑遍全中国……

这座四合院的建筑，一应俱全。有兵器库、礼堂、盥洗房、小花园、马厩等。在土、木、石结构中，还有中西合璧的走马转角楼。走马转角楼通廊将东、南、西、北四连连为一体，堪称中国最长的楼中通廊。整个建筑很雄伟，这种连通四方的回廊让数以百计的将军走向四面八方，其中少将以上军衔者就有300余人。

当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将军们在两位元帅的率领下不再沿着小操场奔跑，奔赴抗日前线时，有一群人却反向而行，从沦陷区来到了云南。这是一群文化精英，这是一群青年学子。这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师生千里迢迢来到了云南，组建了西南联大。

为武者上阵杀敌，为文者研究学问，一武一文，文武双全。这是任何敌人都无法战胜的。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在“隆隆”的炮火声中，西南联大在短短数年中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其本身也成了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醒目的文化符号。

西南联大师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坚定担当和心怀民族复兴的强烈使命，为民族独立、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在抗战的八年中，西南联大师生一边跑警报，一边做学问完成学业。他们时不时昂头望着天空，时不时又低头看着书本。昂头向上虽然是防着敌人的飞机轰炸，同时也表现出了不屈的高贵和尊严。无论在什么地方躲避敌人的飞机，他们抬起的头颅望着的不仅仅是敌人的飞机，他们望着的是民族的未来，志在高远。当他们低头向下时，他们又回到了现实，必须认真学习，必须做好自己的学问，为一个民族留下文化的种子。

我关注着在展览墙上的一张西南联大外国语文学系的课表。从课表来看，外国语文学系的课程主要分为国内文学、外国文学和其他课程：由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等教授《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左传》以及中国通史，古代神话与传说等等；由叶公超、钱钟书、卞之琳、吴宓、闻家骅等教授英文、法文、英诗、西洋小说等等。此外还有微积分、普通物理学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西南联大的许多课程没有统一的教材和教学大纲，同一门课程往往由不同教师根据自己的研究特长进行讲授。从不照本宣科。往往是先开一个书单子，让大家自己看，有一个提纲，学生们在课堂记笔记。写毕业论文时，也不会替学生定题，让同学们自己选题。讲课精彩的教授，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听，也可以同时旁听。特别是吴宓、吴晗等教授的课，他们记忆力惊人，在黑板上写纪年表，不用看书，没有教案，讲史信手拈来。因为学校面积大，课堂分散，听完一节课后，得跑去另一个教室，位子没有了，经常要站着听，站着记笔记。条件艰苦，但学习氛围却极好。图书馆的门只要一打开，大家就蜂拥而入，没位置的人只好站着看书，或者去泡茶馆，泡一杯茶。这种教学方式即便是在现在都不落后，同学们的学习热情也让人称道。

清晨，在校园内有同学在读书，在校外不远的田边，在地埂，在坟场都有一片片琅琅的读书声。入夜，宿舍里的灯都熄了，饭厅里却熄灯晚，学生就抓紧时间去饭厅去读书。考试是经常的，每周有小考，每月有中考，每学期有大考。每学期没有拿够学分就会被开除，即便考到59分，老师也绝不会“拉你一下”。所以，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学生有8000多人，最后拿到学位的只有3000多学生。

联大学生宿舍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的，其实就是一个茅草棚。条件艰苦，拉一块布当帘子，就算是一间。一个房间住二十多人，用上下铺把房间分割成小格子，四个人面对面住，组成一个学习小组，中间摆一个箱子就是书桌。有的学生和教授还有外国留学生一起住，当年的西南联大还招收了印度、缅甸、越南的留学生。

1939年夏天，远在湘西的汪曾祺告别江南，来到云南，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汪曾祺的目标是他的偶像沈从文。汪曾祺听沈从文的“创作实践”和“中国小说史”课。汪曾祺第一次写小说，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一点，为哲理一点，被沈先生批评。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沈从文总是夹着一大摞书走进教室，把仔细批改后的习作和找来的书发给学生。有些资料他就自己抄，用毛笔抄在当地产的竹纸上，抄成了，卷成卷儿，上课时发给大家。

1943年里，李约瑟主持的英国文化科学委员会驻华使团访问云南。他在报告中写道：中国科学工作者在自己国家的边远地区坚持研究，表现出顽强的毅力和勇气。在逆境中，他们表现出非凡的乐观与豁达。

为躲避日机轰炸，西南联大相应调整了授课时间。上课时间不得不更改到早晨7时到10时，下午3时到6时，每一堂课的时间也缩短到40分钟，中间休息5分钟。这5分钟实在是不够的，因为两个教室间的距离常常要走十几分钟

才能到，只得在下课以后快跑到另一个教室去。

联大师生心中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同时又是乐观和豁达的，这从跑警报中可见一斑。不叫“逃警报”也不叫“躲警报”，就叫“跑警报”。不“躲避”也不“逃遁”，跑着望天，跑着背书。那种紧张中透出的从容和风度是对日本鬼子最大的轻蔑，同时也透露出中国人最伟大的民族性。

昆明的市区由于地下水位过高，不可能修筑防空掩体。每当警报响起，同学们绝不迟疑，但也并不慌张，从各个教室跑出来设法向北边的山坡上跑。最大的问题是担心校舍以及舍内的行李被炸。吃也是一个问题，早晨只吃了一碗稀饭，而一跑警报便是4点钟后，甚至要挨到8点钟，挨饿是家常便饭。

所以，联大学生跑警报往住是衣冠不整，不修边幅，夹着书本，一边吃着东西，一边淡定出城门，到后山上看书上课，这形成了一道抗战时期昆明近郊的风景。有时，空袭警报来时正在上课，教授和同学一起跑向山坡，敌机轰炸刚过，警报还没有解除，教授就聚拢同学，继续讲他没有讲完的课。

在疏散的人群中，金岳霖拎着装满书稿的公文包，傅斯年扶着患有眼疾的陈寅恪，费孝通则牵着行动不便的妻子……这都是你现在无法想象的情景。

金岳霖刚刚完成专著《知识论》的写作，在跑警报时，就带着文稿往山上跑。上山后就坐在装稿子的公文包里。轰炸结束，天黑了，金岳霖站起来就走，稿子丢在山上，再也没有找到。数年的心血，70万字的手稿就这样消失在敌机的轰鸣声中。

陈寅恪的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也开始下降，他坚持准点上课。跑警报时，他跑不远，也上不了山，就带着凳子，在一个大土坑中躲避。昆明雨多，土坑里水深盈尺，他常常坐在水里望着天空，等待警报解除，陷入沉思。这位大学问家当时又在思考什么？

从跑警报中，你能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遇到困难时的那种幽默，那种尊严。这一切显得夸张，从夸张中你又看到了荒诞，从荒诞中你又看到了魔幻。在现代人心里的这一切才真是魔幻现实主义。正如汪曾祺所说：“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下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远征不服的。”

现在，西南联大还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学术圣殿。当年的师资队伍堪称“豪华”，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潘光旦等等，汪曾祺曾评价西南联大为：“可以彪炳于世界大学之林，奇迹一样的‘空前绝后’的大学”。多年之后，从西南联大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175位院士……在战争中西南联大培养出了大批蜚声中外的杰出人才。

在战争中云南人民给了西南联大师生一个落脚点，西南联大师生立于此点，为站起来的中华民族提供了伟大的精神力量，同时，西南联大师生也给云南带去了北方的、中原的文化，这是一种双向的润育。

中日战争，是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的战争，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战争。时局虽然艰难，但学生们坚信，敌人摧毁了我们的艺术城，破坏了我们象牙塔，可是毁灭不了我们5000年的文化种子。敌人的侵略，只能暂时改变我们的生活，可民族精神依然兴旺，不可改变，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炮火洗礼中变得更加刚毅、勇敢和坚强。

东陆园情思（组诗）——贺云南大学百年华诞

和家胜

九十五级台阶

青石板
高托举起
攀登者的
足迹和汗滴声
日夜咀嚼
春天的故事

银杏大道

一片片
随风飘落的
金灿灿的
诗句的
美丽
喂饱了
整个秋天

钟楼

一首长诗
高耸立在
每个师生心中
每当它被风儿
吟诵时
便会吊起一个
大大的美丽校园

小松鼠

清晨
一只只在银杏枝头
觅食嬉戏的
小松鼠
洒下的欢乐
却升腾起万千学子
不尽的乡愁

拾起一片银杏叶 拾起一个秋天

在秋天
我喜欢弯下腰去
拾起一片片金灿灿的
随风飘落的银杏叶
让飘落的美丽
唤醒我内心的浪漫
拾起一片银杏叶，拾起一首诗

在秋天
我更喜欢沐浴在
银杏飘金的
叶雨中
让热烈地燃烧
点亮我对生活的憧憬
拾起一片银杏叶，拾起一个秋天

老教授

举一白
头如雪
照亮学子
黑夜里
读
星星

校园里

在这里
同学们舒展的
不是青春
而是一双双
解冻青春的
翅膀

难忘当年战斗豪情

官玉华

新春时节，我们乘坐的中巴车穿越阳光的海洋，拨开河谷气候的幔帐，在玉溪市易门峡谷中的绿汁镇小广场停下。

小广场是两个灯光篮球场，正前方是当年的舞台，灯光设备依旧，长方形的舞台顶部正中是熟悉的五星大圆章，左右3面红旗护卫，下方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一排红色大字。久违的时代烙印一目了然的舞台，顷刻间将时光拉回到当年沸腾的时代。

在绿汁镇稍作调整后，一行人到达三家厂矿山的铁桥边。两座杂木乱草笼罩的山体间，坍塌的山体形成的青灰色山坡，从山顶一直蔓延到山脚，将两山的峡谷堆积成山坡和新的山梁。

抵近深邃的矿道，努力复原当年那群最勤奋的人，大步走进矿井，坐着罐笼深入大山底部，甚至到达绿汁江之下的深井中，双手握着凿岩机，将钢钎奋力扎进岩石的情形。可惜，身边没有当年的掘进工，想象的场景毕竟有虚幻的阴影，并不能真实再现历史上这段时光的精彩。

所幸，身边隐藏着一位当年的掘进工，就着一杯白开水，坐在一把普通的椅子上，讲述出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身边的掘进工，是现云南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杨红昆。退休之前的身份，是省作协副主席、秘书长。这位作家，应该跟掘进工完全搭不上边，但想不到他竟然还有4年的矿工经历。不仅见证了易门铜矿的兴盛，还是用凿岩机将钢钎硬生生打进矿脉的青年掘进工，并且曾经在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代表青年突击队，在千人大会上宣誓表态，要以优异的成绩，大战红五月，向劳动节献礼。

话题打开，他的回忆从初进矿山开始，娓娓道来。平静的叙述中，厚重的生活经历带着铜的质感，沉甸甸直达心深处。

1971年12月，19岁的他，以知青身份参加工作，由泸西县前往易门铜矿报到，背着塞满行李的一个樟木箱子，用网兜装了解盐盆、搪瓷口缸、毛巾牙刷，跳上解放牌卡车，跟车上的知青们一起，踏上了铜矿工人之路。

卡车沿着山路逶迤前往绿汁镇，以二三十码左右的时速缓慢行驶，车后卷起的灰尘，落在车厢里的人群身上，渐渐地，兴奋被疲惫取代，以至于到了72道拐，俯视山下的绿汁镇时，只将“到了”这句话冲到喉间就咽回去。

卡车走完72道拐，进入绿汁镇的时候，满心欢喜的他发现卡车没有停下的意思，而是穿过绿汁镇，驶进绿汁江边的山路，继续向前行驶。扭头看着远去的小镇，隐隐的失落感油然而生。看来，之前将矿山的环境想得再好。

情绪低落的当口，偏偏卡车来到三家厂。一眼看到坍塌的山坡，不由心中暗暗发凉。快到小木奔的时候，瞥见山坡上的一片坟地，好奇地打听，说是烈士陵园，矿山因公牺牲的都埋在这里。遥望陵园中的坟堆，这才恍然，在矿山当工人，存在用生命做代价的风险。

爬上一座山坡，穿过一个隧道，大片厂区出现在眼前，这才到达此行的终点易门铜矿“凤山分矿”。长途跋涉，刚参加工作的兴奋感消失殆尽。报到之后，新工人按人头每人发两套咔叽布工作服，一个口罩，一顶安全帽、一双黑色高筒胶皮水鞋。1971年，蓝色的劳动服堪称当时的礼服和标签，就算是出入高级厅堂，也自带激荡之气。车站、码头处，更是引人注目。穿上劳动服，左胸前的部位赫然印着“云南冶金第三矿”几个字，让到矿山的后悔心情又有了些许释然。

工业生产有自身规律，岗前教育培训必不可少。第一堂课便是到三家厂忆苦思甜爬老湾，体验新中国成立前的旧矿洞，感受那个时代的矿工生活。易门铜矿开采早在明万历年间就有一定规模，清乾隆年间达到鼎盛，之后一直开挖不断，遗留了大量旧矿洞。

同伴依次进出口只能容纳一个人身的矿洞，局促感令人紧张、压抑，仿佛受到密闭恐惧症的挤压。跟着又到新矿井，进到开采面，高大的空间，工作的气概就是不一样，令人豁然开朗。新矿井跟旧矿洞有交集，交集处会有神奇的场景出现。尽管旧矿洞封闭良久，铜矿的耀斑肉眼可见，蓝色的孔雀石在头顶闪闪发光。“这就是铜矿。”他被眼前细碎的的光芒吸引。而足够卡车行驶的新矿井，开阔、通畅、明亮、透气性好。

4年的掘进工生涯，在大山的肚腹中端着45公斤重自动凿岩机工作的情景，至今仍镌刻在他的脑海中。封闭为影像的高潮部分是打天井，只要回忆的按键启动，便如激光三维画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

作为掘进工，在整个矿井掘进过程中，打天井最难。穿着雨衣、长筒水鞋，从平巷位置向上打。抱着45公斤的凿岩机，先用60厘米长的钢钎找眼，每掘进20厘米后，换80厘米、1米、1.2米的钢钎，20厘米20厘米往里打。打到高处，要站在吊罐中打眼。一

开始还好，天井较浅，打到十多米的时候，如果不能克服幽闭恐惧症，无法在这样密闭的环境中坚持。打眼有讲究，要打出主眼、副眼、边眼共16个眼。尽管戴着双层口罩，依然挡不住石屑、粉尘的粘连，哪怕随时用水清洗。精疲力竭下班后，到澡堂冲洗，还是从脸上揭下一层带着硬壳的灰泥。

打天井的方式，还有一种更加困难，就是“打棚子”的方式。通俗点说，就是在天井中边掘进边搭“脚手架”。只不过这“脚手架”是从平巷处自下而上。打棚子的天井，通常是在不适宜安装罐笼的矿脉区域。当从矿井底部向上打到2米左右的时候，在坚硬的岩石天井左右两边打四个石窝，然后将两根镶木塞进眼窝，打上楔子固定好，再搭上50厘米左右宽的木板，一个“支护”便算完成。掘进工便站在这脚手架上向上打眼。天井每向上掘进两米，便要做一层支护棚子。一般来说，天井的高度在18到20米左右，相当于6层楼的高度，通常要搭8个左右的支护层。

对掘进工来说，最怕的就是打棚子。一根镶木，二三十公斤的重量，而且湿滑，不容易搬运。在低处还好，上了10米以上的高度，要将镶木从底部吊上来，镶木加上麻绳的重量，相当于凿岩机的重量，极其耗费体力。不同于安装罐笼的天井，有通风孔，打棚子的天井，通风条件恶劣，打眼时水雾弥漫，石屑飞舞，经常出现体力透支的情况。

如果就是这样的情形，也还算幸运。最怕的是天井打到10多米的时候，一炮过去，第二天到达现场，棚子被震落，木板、镶木掉落在天井的底部。这个时候没有选择，只能一层一层恢复。而恢复比重建更加费力。打棚子的镶木和木板，在天井里被滴落的岩石水浸泡之后，又湿又重又滑。吊运的麻绳也是又湿又重。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将镶木吊上10多米高的位置固定，恢复的工作让人无法不产生悲壮的情绪。

为了降低工作强度，避免棚子被炸炸震落，将损失降低到最小，他的班组想过各种办法。最有效的办法是爆破前将顶部的木板取下来，放在洞室中。第二天上班再恢复。这个办法虽然麻烦，但比起恢复受损的棚子工作，比起从十几米的高处用手抓吊湿滑重的镶木，这份时间大大值得付出。

天井打到一定的高度，每上升3米左右，技术员会将勘测好的洞室的位置标注好。这个时候，需要暂停向上掘进的工作，打出几个较浅的洞室。待天井打好之后，再将这些洞室扩宽加深，将深孔机搬运进洞室，由深孔组打装填炸药的洞眼。在这之前，洞室有重要的作用，就是存放凿岩机、钢钎、麻绳、木板、镶木以及各种材料，包括炸药。要知道，向上吊3米跟向上吊十几米，体力的付出是几何等级的递增。

即便如此，凿岩机一旦出现故障，就要送去到机修厂修理，而这样的事即使不情愿也是经常发生。凿岩机修好，45公斤的凿岩机加上十几米麻绳的重量，要拉上五六层楼的高度。毫无例外，每次拉得人手脚发麻发软，浑身的汗水和天井中的水滴混在一起，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泥水。

所以打天井、打棚子一定是体力最好最能吃苦耐劳的班组，尤其青年突击队是首选。正是因为耗体力，工作强度大，需要打棚子掘进的天井，一个班组通常5个人。2个负责用凿岩机打眼，2个负责打棚子，维护修缮支护，1个打杂，维护电路、水路、高压气泵，同时负责背炸药。炸药在平巷的炸药库，领取之后，装在麻布制成的简易“搭裤”中，将“搭裤”放在肩上，炸药放在胸前后背的“搭裤”中，小心带进天井，放进最高层的洞室中，等待装填进洞眼爆破。

底部的棚子有简易木梯，到了高处，连木梯都没有，只能像做“引体向上”一样抓住棚子，用拉力拉上去。期间的辛苦，只有当事人可知，语言文字实在无法形容。

高强度的劳作，加上吃饭时间不规律，虽然工作期间有顿劳保餐，还是累出胃病，不时发生胃绞痛。而胃病，在矿山属于常态，只能在胃绞痛发作时，到医务室打一针，回来继续扛着凿岩机打眼……

说到这里，杨红昆停下话头，神情凝重地说：“易门铜矿，或者说云南冶金第三矿，因为资源枯竭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但是矿上这群新中国最勤奋的人当中，我自豪曾经是其中的一员，更自豪流淌的汗水跟铜有过最亲密的交融。这种勤奋有遗传基因，会一代代传下去。事实上，这种精神正在延续。”

不仅是易门铜矿，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40后到60后，这群称得上全球最勤奋的劳动者，带着“只争朝夕”的信念，一天当两天干，干出了改革开放的坚实基础，筑牢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石。这群最勤奋的劳动者，遍布中华大地，大格局大情怀，牺牲自我小家，不计个人得失，是新中国的隐性脊梁。他们大多与共和国同龄，已然斑白的头发上，写满的是无怨无悔和老骥伏枥的壮志豪情。